

国际问题探索 ·

中国大陆首次核爆炸试验前后的美台冲突

朱明权

(复旦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摘要] 在中国大陆进行首次核爆炸试验前后,美台之间对中国大陆的核能力的影响以及应当采取的对策的分析出现了重要的分歧。约翰逊政府拒绝了蒋介石对中国大陆进行军事攻击的建议,也否决了蒋介石索取更多军援建立所谓完全的空防体系的要求。从深层次分析,它既表明了美台对于核武器威慑能力的不同认识,也反映了美国的对台政策总是从属于它对中国大陆的政策。这表明,在中美合作对美国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大背景下,那种指望依靠美国的支持实现从中国版图中分裂出去的台独企图最终只能是一枕黄粱。

[关键词] 中国核试验 美国对华政策 美台关系 核威慑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进行了第一次原子弹装置的爆炸试验。这次试验获得的圆满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之后第五个自行研制原子弹并实施核爆炸试验的国家,对世界政治产生了广泛和重要的影响。

中国首次成功的核爆炸试验对美国的对华政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是,至今的研究主要是从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政策的角度进行分析,从美国对中国台湾的政策的角度所作的探讨则要薄弱得多,量少且缺乏系统性,通常只是在论述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政策时附带提及。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本文将通过对近年来美国有关解密档案的更为深入的研究,集中探讨中国第一次核爆炸试验前后美国约翰逊政府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台湾当局之间出现的冲突及其原因。

虽然美台为搜集中国大陆的核情报进行过重要的合作,虽然蒋介石试图利用大陆的核试验推动美国赞同对大陆的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但是,总的来说,约翰逊政府对于台湾当局的此类建议以及从美国获取更多的军事援助的图谋采取了反对和抵制的立场,从而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度不满。从直接原因来看,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美台间的这一冲突产生于华盛顿对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梦想的否定以及1964年竞选政治的需要;从深层次分析,它既表明了美台对于核武器威慑能力的不同认识,也反映了美国多年奉行的敌视新中国的政策陷入的困境以及约翰逊政府在此问题上开始的反思。事实表明,美国的对台政策总是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且从属于它对中国大陆的政策。

美台之间的情报合作与分歧

至少从肯尼迪入主白宫开始,美国政府就高度关注中国核力量的发展进程,并为此同台湾当局进

[收稿日期] 2008-05-29

[作者简介] 朱明权,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与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国家创新基地项目“美国对外政策:约翰逊时期”(项目批准号:07FCZD024)的中期成果。

这方面的主要成果包括:William Burr and Jeffrey T. Richelson, “Whether to ‘Strangle the Baby in the Crad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Nuclear Program, 1960 - 64,” *International Security* 53.3 (Winter 2000/01): 54 - 99; 郝雨凡:《从策划袭击中国核设施看美国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陈长伟:《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的美台反应》,《百年潮》2006年第5期。

行了密切的情报合作。与此同时,它们在估计中国大陆首次核爆炸试验的时间方面也出现了分歧。

新中国成立后,美台一直联手收集有关中国大陆的信息,特别是军事情报。最初它们使用的主要是国民党特务,到了1950年代末期则主要依靠侦察机以及截获电子信号收集情报。一方面,美国向经过特别训练的国民党的飞行员提供P-2V和RB-57A等侦察机,让他们飞往大陆上空;另一方面,美国从日本北部到泰国沿中国大陆部署了许多地面电子情报站和水上情报船,而台北则是此种窃听活动的大本营。但是,美台为此付出的代价十分昂贵。此外,这些手段的侦察能力也都有着明显的局限性。1960年12月6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题为《共产党中国》的“国家情报评估”就说,“我们关于共产党中国的核武器计划的证据是支离破碎的,就像我们关于苏联援助的性质和程度的情报一样”。

正因为如此,在肯尼迪入主白宫以后,美国就加快了利用美台共同组织的“黑猫中队”对大陆进行间谍摄影的努力。所谓的“黑猫中队”的正式番号是国民党空军第35独立中队,成立于1960年底,由国民党空军精心选拔的飞行员组成,以台北的桃园机场为主要基地。美国中央情报局则负责训练飞行员以及提供“黑猫中队”所需U-2高空侦察机和其他装备。从1961年4月起“黑猫中队”开始深入中国大陆进行所谓“穿幕”飞行。1962年1月13日,一架U-2飞机首次飞到了甘肃双城子附近的导弹发射场。以后,侦测中国西北一带的核设施就成为“黑猫中队”的一项主要使命。它的U-2侦察机经常围着青海格尔木、甘肃兰州和酒泉、新疆罗布泊和内蒙古的包头打转,为美国带来了重要的情报。例如,在1963年3月的一次侦察中,U-2侦察机在包头附近发现了一所很奇怪的新建工厂。从所摄照片分析,美国的有关专家判断它安放了原子反应堆,以生产钚-239。1963年的3月和6月,U-2侦察机拍摄到了兰州气体渗滤厂的照片;1964年的某个时候,U-2侦察机在甘肃酒泉附近发现了一个钚反应堆。从1961年到1965年,U-2飞机深入大陆内地执行任务共约30余架次。

与此同时,美国也曾使用自己的飞行员驾驶U-2侦察机从一些亚洲国家起飞对中国进行间谍飞行,其任务主要是对华南地区的目标进行侦察,偶尔也会深入中国内地搜寻核设施。例如,1964年春,从印度查巴希基地起飞的U-2飞机就将罗布泊列为侦察目标,进行了两、三次的飞行。不过,到了这年夏天,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变得格外谨慎。一方面,这是因为它担心此举一旦泄漏会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另一方面,196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约翰逊指望凭藉自己的努力再次登上总统的宝座,担心美国飞行员驾驶的U-2飞机万一被解放军击落会给竞选对手提供攻击的借口。为此,在收集有关大陆核设施和核试验的情报的问题上,美国始终严重依赖于台湾当局。

尽管在收集中国大陆发展核力量的进程方面美国与台湾当局密切合作,但是,对于中国可能进行首次核爆炸试验的时间的估计美台之间存在明显分歧。

还在1964年4月16日访问台北时,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就同蒋介石谈到,中国大陆不久就会进行核试验。他声称,“中共”有可能“在今年年底或明年爆炸一枚核装置”。但是,蒋介石怀疑大陆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就会掌握核能力。他说,在他掌握的情报的基础上,他“不相信共产党人在接下来的三、五年中能够爆炸一枚核装置”。

本节有关美国和台湾当局情报合作的材料,主要来自翁台生、包柯克所著《黑猫中队》,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高群服所著《台湾“黑猫中队”揭秘》,《台湾周刊》2005年第12期,以及威廉·伯尔(William Burr)和杰弗里·里奇尔森(Jeffrey T. Richelson)所著上文。

CIA, NIE 13-60, “Communist China, 6 December 1960” <http://www.foia.cia.gov/browse-docs.asp>. 美国的“国家情报评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简称NIE)是美国情报界就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所涉的重大问题进行的中长期的分析。这一评估由中央情报局牵头,国务院、国防部等机构的情报部门参与准备,因此具有很大的权威性。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after FRUS), 1964-68: China, Vol. XXX (Washington D. C.: the U. S. Printing Office, 1998) 50.

可以从两个方面对这种分歧作出解释。一方面,尽管当时美国利用台湾当局获取有关中国大陆的军事情报,但是它并没有让其充分分享这方面的情报。《黑猫中队》一书也说,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驶的U-2侦察机刚一落地,它所使用的胶卷“立即转送日本美军基地冲印”,十天后台方才能获得所摄照片。虽然这是有关协议的规定,但是当时台湾方面就怀疑美方可能截留了某些情报。另一方面,美国还有自己的获取情报的渠道。除了以上提及的美国飞行员驾驶U-2飞机从印度查巴希基地起飞对罗布泊进行的侦察飞行外,中央情报局还通过代号为CORONA的卫星侦察计划收集有关中国的核设施的情报。仅从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该计划就完成了24次侦察中国的任务。例如,1961年12月,卫星首次提供了罗布泊的图像,尽管当时华盛顿没有意识到那可能是一个核爆炸试验场。此外,卫星还可以飞经U-2飞机无法达到或者很难达到的目标。可以想见,美国通过间谍卫星等其他手段获取的情报,更不会毫无保留地转送到台湾。

蒋介石对大陆实施军事打击的建议与美国的否定

1960年代初,新中国确实面临着相当复杂和严峻的考验,包括中印边界发生的武装冲突,中苏关系的迅速恶化,国内经济和人民生活持续经受的严重困难。这些都使蒋介石感到实现其“反攻大陆”计划的时机已经到来。为此,蒋介石竭力说服华盛顿解除对他的束缚与限制,支持国民党军队对大陆发动武装进攻。1963年9月11日,时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的蒋经国在拜访肯尼迪总统时转交了蒋介石的一封附有备忘录的信。备忘录说,采取会在大陆“激起一场爆炸”的游击队空降和突袭队袭击的时间已经到来。大陆核能力的发展似乎又为蒋提供了一个新的口实。但是,尽管约翰逊政府与其历届前任一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有强烈的偏见和恐惧,它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理解仍然要比蒋介石深刻得多,对国际形势以及中国大陆的认识也要比蒋介石全面得多,在可能陷入一场新的朝鲜战争的问题上更是比蒋介石谨慎得多。为此,在中国进行首次核爆炸试验的前后,一方面,约翰逊政府十分关注台湾当局的心理反应和政策反应,加紧与之进行磋商和对之进行安抚;另一方面,约翰逊政府断然拒绝为蒋介石火中取栗和否定了他对大陆实施军事打击的建议,声称这种打击不仅无法取得成功而且会将美国拖入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强调美国强大的核能力和核威慑政策足以保证台湾的安全。

1964年4月中,约翰逊政府的国务卿腊斯克访问了台北,并在4月16日拜访了蒋介石。除了提及中苏争论、中美华沙谈判和日台关系等问题外,腊斯克还特别对蒋谈到了中国大陆首次核爆炸试验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位国务卿表示,他现在重视的是此事的心理作用,而并非是该爆炸具有的军事意义,因为“还要许多年”中共才能发展出“真正具有重要价值的核力量”。腊斯克并强调了美国核力量的强大及其具有的威慑作用,希望蒋介石能对美国的核武器具有的“难以想象的威力”留下“深刻印象”、“感到放心”。他故作神秘地告诉蒋介石,美国在欧洲部署的核武器所具有的毁灭能力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用过的武器的15万倍,而这还仅仅是美国核武库的一部分。总之,腊斯克极力淡化中国核试验的军事和政治价值,而将它的影响仅仅说成是心理上的。腊斯克这样做,当时显然是为了给蒋介石打预防针,减少他对大陆不久后会拥有的核力量的恐惧。从长远来看,美国正是利用核威慑理论否定了台湾当局要求对大陆进行军事打击以及大规模增加对台军事援助的意图。

如前所述,在这次谈话中,蒋介石声称他并不相信在今后的3-5年中大陆能够爆炸一枚核爆炸装置。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他并未对腊斯克的观点作出很具体的回应。但是,蒋介石以很大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after FRUS), 1961 - 63: Northeast Asia, Vol. XXII (Washington D. C.: the U. S. Printing Office, 1996) 386.

FRUS, 1964 - 68: China, Vol. XXX (Washington D. C.: the U. S. Printing Office, 1998) 50 - 51.

FRUS, 1964 - 68: China, Vol. XXX (Washington D. C.: the U. S. Printing Office, 1998) 55.

篇幅谈到了大陆面临的困难以及对大陆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双方的观点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蒋介石声称,中苏冲突“更可能会继续下去”;“除了经济问题外”,大陆还存在“不胜枚举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大陆的军队也出现了“动摇和不忠的迹象”。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对大陆实施军事攻击的问题。腊斯克对此的回应是,尽管当前只是“一个剧烈变化的时期的开始,其结果还很难确定”,但是据他的判断,在大陆的庞大军队面前,国民党“军事上无法在大陆立足”,除非它能得到“来自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大规模援助”,这种援助将需要“美国军事力量的卷入”,甚至可能需要核武器的使用。他还说,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将被迫支持毛泽东,从而“整个北半球会陷入战火之中”。也就是说,腊斯克认为,国民党军队对大陆的袭击难以成功,并将美国带入一场与中国乃至苏联的战争。

随着中国大陆成功地进行了首次核爆炸试验,美台之间在是否应当对大陆进行军事打击的问题上的分歧也变得突出起来。约翰逊政府加紧与台湾当局进行沟通,阻止其采取违背美国的政策的做法。

1964年10月17日,也即中国进行核爆炸试验的次日,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就将有关的信息传送给台湾的“外交部”。10月19日,驻台“大使”杰罗尔德·赖特(Jerauld Wright)又为此专门拜访了蒋介石,了解蒋本人的看法。蒋在谈话中强调大陆的核爆炸在亚洲造成了美国人无法理解的影响,鼓动美国要为此采取新的对策。他声称,这是一个“具有深远的重大意义的事件”,对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心理上的反应是“巨大和深远的”;就亚洲人民的态度而言这是一个“转折点”,他们对世界事务的看法将因此“不同于过去”。蒋还说:“无论是生活在国内还是国外的美国人都无法真正理解亚洲人民的心理”,美国必须作出“特殊的努力”才能了解他们的心理变化。蒋最后说,“今后的亚洲与过去的绝不会一样”,美国和“中华民国”在这个时候应当依据“现在和未来”而非“过去”重新评估它们对中国大陆的政策,为寻求“新的解决办法”而“共同努力”。

为了进一步与台湾当局交换对大陆核试验的看法,1964年10月下旬,中央情报局的两位副局长又先后访问了台北,其中一个专门负责情报事务的雷·克莱因(Ray S. Cline)博士。他曾担任中情局台北站站长,与台湾政要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克莱因先在10月23日会见了“外交部长”沈昌焕、“国防部长”俞大维以及“国防部副部长”蒋经国。沈昌焕声称,台湾的老百姓对大陆核力量极为“恐惧”,担心三枚小型核弹就能摧毁基隆、台北和高雄。他还以嘲讽的语言表示了对美国的核威慑政策的不满。他说,在知道一旦自己死于大陆的核攻击后美国将“对中共进行报复”,那也算得上是一种“小小的安慰”。俞大维则警告说,只有面对着“有理性的人”时核威慑才是“可信的保证”,而“中共是非理性的”。

次日克莱因拜访了蒋介石本人。蒋介石的反应则更为激动,因而表述也颇为混乱。梳理一下,蒋实际上表达了这样一些观点:大陆的主要目标是“摧毁”他本人和“中华民国”这一“靶子”,但是当此种目的真正达到时,“整个亚洲都会受到威胁”;美国的“孤立”大陆的政策已经“不敷使用”,大陆对于这样的政策已经具有了“免疫力”,因而可以“不受干扰地”完善“其核能力”;那种美国会对大陆进行“核报复”的话不值一顾,因为美国会受到其“欧洲盟国”的“阻扰”,而且在“中华民国”被“摧毁”之后再“支持”它乃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是要它“等死”;如果中共“成功地摧毁了”“中华民国”,他们很可能会和苏联人“妥协”。最后,蒋介石尖锐地表示,今天“无论谁在苏联掌权”都知道只有蒋介石能够“埋葬”毛泽东,美国人却似乎不知道这一点;过去美国因为“害怕苏联的反应”和因此出现的“世界性冲突”而对“中华民国”的反攻计划“心怀疑虑”,现在是美国“检讨”它的政策的时候

FRUS, 1964 - 68: China, Vol. XXX (Washington D. C.: the U. S. Printing Office, 1998) 50, 42 - 44, 47.

FRUS, 1964 - 68: China, Vol. XXX (Washington D. C.: the U. S. Printing Office, 1998) 112 - 113.

FRUS, 1964 - 68: China, Vol. XXX (Washington D. C.: the U. S. Printing Office, 1998) 116.

了,要么选择毛要么选择蒋作它的“朋友”。那么,蒋介石到底希望美国做什么?他在这次谈话中应该明确提到,可惜其内容尚未解密。虽然如此,从字里行间,我们还是可以推测,蒋介石很可能是想借大陆爆炸了第一枚核爆炸装置之机,竭力推动美国或者对中国大陆直接进行军事打击,或者支持台湾当局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正是出于这一目的,11月初,蒋介石又间接地通过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国民党元老张群向赖特提出了访问华盛顿的建议。

然而,蒋介石希望美国直接或者支持他对大陆使用武力的要求,是自杜鲁门以来的历届美国政府都不愿满足的,更准确地说是它们都不敢满足的。正在考虑调整僵硬的对华政策的约翰逊政府自然更不会例外。所以,它对蒋介石的访问华盛顿的建议迅速表示了拒绝。副国务卿乔治·鲍尔(George W. Ball)在1964年11月20日发给驻台北“大使”的电报中说,国务院认为这个时候蒋介石对美国的访问是“不可取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蒋显然试图通过此行为“中华民国”反对大陆的活动寻求“更加强烈的支持”,而这是美国不能同意的,他会“失望而归”。

固执的蒋介石并未因此放弃努力。1964年11月23日,蒋介石又通过美国驻台北“大使”赖特给约翰逊总统转去了一封信。用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邦迪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罗伯特·科默(Robert W. Komer)的话来说,这封信是“又长又乱”。按照他们的归纳,蒋首先分析了形势:今天“最大的威胁”是中共而非苏联;中共正在东南亚从事一场“持久的消耗战”;中共的核试验造成了一种“新的威胁”,主要是危及到“自由的亚洲人的士气”。然后,蒋介石提出了美国应当采取的三种做法:(1)立即发展一种可以“迅速赢得”越南战争的战略;(2)带头发展一项由“自由亚洲的各国人民自身”及时采取行动“推翻中共”的“全面计划”(如“装备和不再束缚中华民国”);(3)假如目前还无法做到上面这一点,应“立即赋予中华民国摧毁中共核设施的资源”。邦迪和科默认为,蒋介石写这封信的根本目的是,“在他感到美国必然正在反思其对华政策的时候”向美国总统重申他的“众所周知的”观点,尽管他也知道美国“不可能接受”这“一系列建议”。

大约一个月之后,1964年12月21日,约翰逊总统的回信通过电报传到了美国驻台北的“大使馆”。他在信中只是笼统地表示了在联合国代表权和台湾的生存问题上对台湾当局的“完全支持”,而回避了上述蒋介石的所有三项建议。更重要的是,他强调美台“应当继续”为蒋本人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在1958年10月23日达成的原则所“指导”,即“主要应通过政治手段而非武力赢得对共产党人的胜利”。约翰逊还进一步指出,美国政府“没有证据表明大陆上公众的骚动正在增加,或者共产党的内部控制正在削弱”,它也“对当前的政治形势有利于主动采取军事行动的说法表示怀疑”。

直到1965年秋,蒋介石仍然试图通过访美的宋美龄说服约翰逊政府同意对大陆进行军事打击。9月20日,在出席国务卿主持、国防部长作陪的晚宴时,宋美龄谈到了对大陆的核爆炸的看法,与腊斯克以及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实际上进行了一场有关中国的核能力和核威慑效果的争论。

在前一问题上,宋美龄声称,中国大陆的核爆炸“不仅对邻近的亚洲国家而且对全世界具有决定性的强烈影响”,它既使“中共在整个世界的威信和影响极大增强”,又使包括“中华民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感到了“极大的担心”。腊斯克则认为宋美龄高估了中国大陆的核能力。他说,尽管法国的核能力要“远远强于”中国,但是与美国的“巨大的”核武库相比还是“很弱”,言下之意是中国的核

FRUS, 1964 - 68: China, Vol. XXX (Washington D. C.: the U. S. Printing Office, 1998) 116.

按照这份报告,蒋介石曾说“如果美国是真正的朋友”,紧接着的两行字应当是蒋介石对美国提出的要求,但是因为尚未解密而被删去。

FRUS, 1964 - 68: China, Vol. XXX (Washington D. C.: the U. S. Printing Office, 1998) 129.

FRUS, 1964 - 68: China, Vol. XXX (Washington D. C.: the U. S. Printing Office, 1998) 133.

FRUS, 1964 - 68: China, Vol. XXX (Washington D. C.: the U. S. Printing Office, 1998) 142 - 143.

能力更加不值一提。关于核威慑效果的问题,腊斯克进一步提出:“我们应当假定我们正在与理性的人而非疯子打交道”,当美国的报复力量肯定能使对手自身从地球上“永远消失”时,“任何理性的人都不会使用核武器”,因为“任何这样的行动都将是纯粹的自杀”。宋美龄则否定了核威慑理论,一方面指责“中共并非是理性的人”,另一方面又声称在一场对抗中力量较弱的一方会采取先发制人的做法。她举例说,当着两个人发生冲突时,一个人有着50发子弹,另一个人只有两发子弹,有着较少子弹的人很可能在对方可以使用他的较多子弹以前就将其“摧毁”。麦克纳马拉这时也参加了辩论。他说,如果只有两发子弹的人认识到首先开枪意味着自己的死亡,就绝不敢那么去做,“威慑力不仅在于较多的武器,而且在于必要时愿意为了报复而使用它们”。

可是,宋美龄并未就此打住,相反却更加明确地提出:“在目前中共的核力量不断增强的情况下”,美国的“唯一行动路线”应当是“提供手段”,以便在这一力量“达到危险的程度”以前就“应用常规力量”摧毁中共的核设施”。对于这样一种建议,腊斯克自然不会认可。他问宋美龄,如果这样,“中共会采取什么行动”?宋美龄说,中共会“掀起一阵可怕的喧嚣”。此话的含义是,大陆的反应只会限于言辞上的谴责。腊斯克则针锋相对地驳斥说,在他看来,“中共的反应将是猛烈的”,基本上会“使用它们的主要武器、它们的巨大人力在其边界之外进行一场进攻性的报复行动”;“如果现在在北京的是国民党人,当中国遭到这样的攻击的时候,他们也肯定会尽一切力量作出反应”。腊斯克进而指出,美国无法通过使用自己的人力资源“抵抗”中国大陆在境外发起的报复行动,而“必须依赖核武器”;于是,美国会“因为发动了一场核战争受到包括中国周边的那些国家在内的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谴责”。腊斯克最后要宋美龄认识到,美国只有1.9亿人口,而中国大陆有6亿多人口,面对这样的人口差距“美国无法在亚洲使用其军队”。

到了1966年,美台间的这种立场分歧依然如旧。在7月4日会见再次访问台北的腊斯克时,蒋介石继续强调,“大国都有责任帮助”在大陆的6亿中国人从“共产党的暴政”下解放出来,国民党“决心重新获得”对大陆的控制。腊斯克则表示,一旦美国“卷入了对中国大陆的任何部分的攻击”,它就必须坚持下去,“直到冲突结束”,而不可能半途退出。这位国务卿还说,他“无法想象任何在美国和中共军队之间发生的全面战争会被局限到常规武器”。在11月2日接见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William P. Bundy)时,蒋介石又迅速将谈话转到大陆刚刚进行的两弹结合试验的问题上。他说,这一试验意味着“中共在6个月中就会处于使用或威胁使用这些武器的地位”,在越南问题上尤其如此。威廉·邦迪对此的回应是,任何这样的使用将是一种极端的“疯狂”,“远远超出”现在可以在中国大陆看到的“非理性”的程度,因为它必然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使用的“大规模(报复)力量”。

蒋介石索取大量军事援助的要求和美国的拒绝

在要求约翰逊政府或者直接地或者支持国民党军队对中国大陆实施军事打击的同时,蒋介石还谋求从美国获得更多的军事装备,以建立所谓有效的空防体系,阻止大陆的飞机的攻击。然而在约翰逊政府看来,这样的体系既是不必要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还在1964年12月10日,即大陆进行首次核爆炸试验后不到两个月,蒋介石就召见了美国驻台北“大使”赖特,呼吁美国政府高度关注解放军不久前在福州部署的L-10战机,声称这些飞机使大陆进攻台湾、沿海岛屿以及船只的能力得到了“相当大的增加”。为此,他要求美国政府按照美台间的军事援助计划加速提供当时尚未提供的军事装备,特别是“小牛”式导弹,以“对付这些威

FRUS, 1964 - 68: China, Vol. XXX (Washington D. C.: the U. S. Printing Office, 1998) 208 - 209.

FRUS, 1964 - 68: China, Vol. XXX (Washington D. C.: the U. S. Printing Office, 1998) 351.

FRUS, 1964 - 68: China, Vol. XXX (Washington D. C.: the U. S. Printing Office, 1998) 350 - 351.

FRUS, 1964 - 68: China, Vol. XXX (Washington D. C.: the U. S. Printing Office, 1998) 410 - 411.

胁”。尽管赖特答应将蒋的要求转告国内,美国军方对台湾这一要求所作的评估却得出了否定的结论:L-10飞机并不代表“对台湾的威胁的重大增加”,因此“加速交付”“小牛”式导弹是“缺乏根据的”。

在获得大陆即将进行核航弹投放试验的情报以后,蒋介石更是加紧向美国索要军事物资。1965年3月20日,在已经成为“国防部长”的蒋经国等人的陪同下,蒋介石与美国驻台北“大使”赖特以及驻台“军事援助顾问团”官员举行了一次特别会晤,讨论对台“军事援助项目”。按照赖特在3月23日发给国务院的电报,这是蒋介石首次亲自出面对美国大使提出“具体的军事要求”。蒋首先谈到了大陆要进行的第二次核爆炸试验和台湾对空防问题的担心。他说,所有的情报表明,“中共的第二次原子弹爆炸即将发生”,此次很可能“从空中进行投掷”,这样“空防的领域”就必须受到关注。蒋具体提出,中共有15架TU-4,即使其中只有一架进入台湾上空投掷了核武器,台湾的“空防体系”也“无法承受”;美国应当“迅速交付”已经列入计划的“奈基-II”式和“鹰”式地对空导弹,台湾已经部署的这些导弹数量严重不足;台湾也需要更多的“响尾蛇”式空对空导弹。此外,蒋还“坚持贬低”核威慑对打消大陆对台湾的攻击意图的“效果”,强调“军事空防体系”是台湾人民理解的“唯一防御”。赖特则坚持对蒋介石表示,台湾的“最好空防是美国的核威慑”。赖特在同一电报中还向国务院提出,“很显然”,必须继续努力向蒋介石表明,美国对“中华民国”的“防御承诺”就像对任何其他民主国家的承诺“一样坚定”,但是美国无法向所有那些可能遭到核攻击的国家提供“完全的空防”,美国的核威慑才是台湾的“最好的空防”。

赖特的建议显然获得了高层的支持。两个多星期以后,1965年4月9日,他又会见了蒋经国,专门讨论美国的核威慑政策及其效用的问题。赖特说,无论什么精心设置的“空防体系”,都无法保证防止“少量飞机的渗透”,甚至美国的空防体系也“不足以确保”这一点。赖特还说,美国没有“反导弹的能力”,对付“导弹攻击”的防御在美国或许“并不存在”;因为认识到这一点,美国已经将“最可靠的空防”置于战略空军司令部,它的报复能力是美国防止自身遭受核攻击的“威慑”力量的“主要贡献因素”;该司令部获得了至今美国用于空防领域的军事预算的“最大份额”。赖特进一步表示,美国核力量的整个报复能力在“慑止对台湾的攻击”方面会是“同样有效的”;尽管理论上存在“台湾的空防为中共的飞机渗透”的可能性,由于面对遭受美国的“大规模报复”的威胁,这种渗透是“最不会”发生的。蒋经国对赖特的解释表示了欣赏,同时为蒋介石的否定美国核力量的威慑作用的立场进行了解释。他说,蒋介石主要担心的是“时间和空间因素”,因为台湾海峡“水域狭窄”,跨越这一海峡实施进攻所需的时间“极为短暂”。

结 论

综上所述,在中国大陆进行首次核爆炸试验前后,美国政府与台湾当局进行了密切的情报合作。与此同时,美台之间对中国大陆的核能力的影响以及应当采取的对策的分析出现了重要的分歧。约翰逊政府成员中的主流观点是,中国的核能力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其效果主要是心理上的。蒋介石则坚持认为,大陆的核武器对所谓民主世界造成了严重的军事威胁,并极大地改变了东亚的政治形势,因此建议美国应当或者直接对中国大陆的核设施实施打击,或者支持国民党军队对大陆使用武力。此外,蒋介石还以防止载有核弹的大陆飞机的袭击为由,要求约翰逊政府向台湾提供更多的地对空导弹和空空导弹,以帮助台湾建立一个所谓完全的空防体系。这些建议和要求都未能得到约翰逊政府的认可与接受。

FRUS, 1964 - 68: China, Vol. XXX (Washington D. C.: the U. S. Printing Office, 1998) 141.

FRUS, 1964 - 68: China, Vol. XXX (Washington D. C.: the U. S. Printing Office, 1998) 156.

FRUS, 1964 - 68: China, Vol. XXX (Washington D. C.: the U. S. Printing Office, 1998) 158.

美台之间这一冲突的直接原因产生于华盛顿对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梦想的否定以及1964年竞选政治的需要。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华盛顿和台北对核威慑作用的不同看法,以及约翰逊政府对美国在中国大陆问题上的处境和利益的判断。这种处境和利益决定了它对中国大陆的政策,而美国的对台政策总是从属于并且服务于对大陆的政策。

到1961年初肯尼迪入主白宫时,一系列因素使得他的政府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低核门槛政策表现了更多的怀疑,提出了取代大规模报复战略的灵活反应战略。3月,在就防务问题向国会提交的第一个咨文中,肯尼迪正式阐明了灵活反应战略的核心目的,即推迟包括战术核武器在内的核力量的使用,从而提高核门槛,使核武器的主要价值明确地转向威慑方面。约翰逊继任美国总统后,核威慑政策更是在美国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越来越多地见之于麦克纳马拉、腊斯克和邦迪等人的谈论和有关的文件、著述中。这一政策是建立在核武器具有的特殊毁灭能力的基础上,它实际上隐含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假设:第一,从道义上看,核武器是一种不可首先使用的武器。当核前时代军事力量的主要作用体现为实战价值时,核武器则只能作为一种最后的报复手段被使用,其主要作用体现为威慑价值。任何与之相反的做法将不仅会在当时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而且将被永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第二,从效用上看,一个核国家拥有的“确保毁灭”能力足以激发其核对手的理性,慑止它们首先发动核打击的意图。核威慑政策最初是针对苏联的,但是后来同样被运用于中国。显然,它是当时的蒋介石所不能接受、甚至无法理解的。

同样重要的是,约翰逊政府与蒋介石之间的争执反映了在中国大陆问题上美国的处境,以及它对自身利益和政策的反思。就处境而言,一方面,从杜鲁门时代美国就开始推行的敌视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已经严重碰壁。国际上,1964年初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不顾华盛顿的反对而与中国正式建交,联合国内反对美国顽固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其合法席位的斗争则一浪高过一浪。美国国内主张改变僵硬的对华政策的呼声也日益清晰。另一方面,美国在印度支那已经越陷越深。1964年8月,以北部湾事件为借口约翰逊政府从国会获得了扩大侵越战争的授权;此后,美国加紧对北越实行轰炸和向南越派兵。但是,越南人民如火如荼的抗美救国斗争使得美军顾此失彼,难以自拔。不难理解,面对这样的处境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所要追求的利益是:即使无法与中国改善关系,也应当避免挑起与中国的武装冲突。腊斯克等人认识到,如果中美之间发生常规战争,美国自然难以与中国对抗,同时还会迫使中国直接出兵援助北越;如果华盛顿使用核武器攻击中国,则美国不仅将遭受广泛的道义谴责,而且会因此在亚洲失去许多战略基地。出于这样的利益考虑,美国自然不会听从蒋介石的建议,去对中国大陆的核设施使用武力,或者支持台湾当局对中国大陆使用武力,以实现其反攻大陆的梦想。事实上,当时美国政府内部就有人认为,中国的核爆炸试验为美国调整对华政策提供了机会。1964年11月2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科默在写给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邦迪的备忘录中就说,大多数人都同意,在对北京维持了15年的“僵硬政策”以后,美国地位的削弱正迫使它采取一种“不同的方针”。现在的问题并非“是否”应当摆脱这种僵硬的对华政策,而是“如何以及何时”去摆脱。科默的结论是,在此意义上,中国的核试验实际上突出了“红色中国就在那里”的事实,彻底摧毁了蒋介石的“内战还在进行”的命题,证明了为什么美国应当与中国在一些问题上进行“对话”。

以上的分析再次表明,美国对中国的领土台湾的政策实际上是从属于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政策,是服务于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一个很短时期内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推行了“让尘埃落定”的政策,这是由于当时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尚在观望时期,并且在考虑是否还有使其脱离苏联战略轨道的可能。朝鲜战争后美国推行的“保卫”但是又“束缚”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政策(如1950年代两次台海危机所显示的那样),是因为美国要利用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

舰”遏制与苏联结盟的中国,但是又不愿为了蒋介石的要求而与中国再次发生“热战”。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核爆炸试验后美国同样如此。除了否定了蒋介石对大陆进行军事打击的企图外,1964年底约翰逊政府还拒绝了蒋介石的访美要求,1966年秋约翰逊不仅不让蒋介石参加在马尼拉举行的所谓亚太地区“自由国家”的峰会,而且甚至不愿在台北作短暂停留,因为当时美国不愿进一步恶化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当然,以后的事态发展,包括尼克松总统不顾台湾当局的反对访问北京,卡特总统为了与中国大陆建交承诺只与台湾当局“保持文化、商业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等等,更加有力地证明了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从属和服务于美国对大陆的政策。因此,可以相信,在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对于台独势力来说,那种指望依靠美国的支持实现从中国版图中分裂出去的企图最终只能是一枕黄粱。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U. S. and the Taiwan Authorities around the Time of Mainland China's First Nuclear Test

ZHU Ming-quan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 Around the time of Mainland China's first nuclear test, the views held by the U. S. government and the Taiwan authorities greatly diverged on the impact of Mainland China's nuclear capabilities and the necessary countermeasures to be adopted against it.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refused Chiang Kai-shek's suggestion to initiate a military attack on Beijing, along with his demand for more military assistance to establish a complete air-defense system. On a deeper level, it not only indicates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nuclear deterrence between the U. S. and the Taiwan authorities, it also reflects the fact that the U. S. policy toward Taiwan is always subordinate to its policy towards Mainland China. It will always be a fool's paradise for Taiwan separatists to seek the island's independence by relying on the U. S. support, especially as the cooperation with Mainland China has increasingly grown in importance to the United States.

Key words : China's nuclear test; U. S. policy towards China; relations between the U. S. and Taiwan authorities; nuclear deterrence

[责任编辑 刘 慧]